

方言永远是人类的DNA

○ 红 孩

成都直播女孩汪汪到北京采访我，送我一束向日葵花，我很喜欢。结束之余，我说，凡·高画的《向日葵》很有名，可你知道吗？在我们北京东郊地区，人们是不这么叫的。汪汪两只大眼睛看着我，说叫什么呢？我说，叫“转日莲”，如果语速更快更简洁，就叫“转儿莲”。注意，在这里，“转儿”的“儿”是用于儿化音使用，不发出声音。汪汪听罢，琢磨了一下，试着说了两遍，虽然没有我说得流利，但足以使她对北京方言产生了兴趣。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北京京味儿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原因是有几位评论家都在说我近期的散文是新京味儿散文代表。我熟悉老舍、林海音、陈建功、肖复兴、王朔等几代作家的京腔京韵，但认真说起来，我的京味儿方言远没有他们掌握得充分、运用得恰到好处。我更注重的是对北京历史人物风情的人文情怀与思想观照。因此，我在新京味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京派，这样似乎更宽容些，也照顾到了那些北漂作家的情绪。

关于北漂文学，我专门写过评论文章，对北京本土作家和北漂作家做了原则界定。毫无疑问，本土作家就是在北京出生，接受儿童少年教育的这帮人。如果不在北京出生，只要在北京上过幼儿园、小学、中学，也算。说白了，你打小得接受过北京方言的熏陶。如果打小不会说北京话，也不了解北京的风俗习惯，那对不起，您还真不算北京本土作家。林海音，也就是写《城南旧事》的台湾作家，她 1923 年 5 岁到北京，读的小学、中学、专科，1948 年离开北京。她写的小说、散文带有浓郁的北京地域风情方言特色，因此可以归入北京本土作家。同样，出生于南京的王朔，他很小就来到北京，虽然在部队大院长大，后来也住过北京胡同，写作用的是地道的市井语言，自然也属正宗的北京本土作家。

我一直说，人类自创造了语言的那一天，文明就开始生长了。通过语言，人们可以认识万物，可以交流思想感情，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族群。如果说，语言是人类的 DNA，那么构成各种语种语言的各地方言，则是 DNA 中的 DNA。有关方言研究方面的书籍很多，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扬雄所著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距今 2000 多年。我最早看到的方言著作是《北京土话词典》《北京歇后语词典》两本书。这些年，随着农村城市化发展，很多乡村纷纷消失。为了保住乡村记忆、留住乡愁，很多地方都在修地方志。我所生长的北京东郊地区，也在大量修乡志、村志。这些史志，除了记录历史、人物、民俗、建筑外，也搜集整理一些方言俚语，读起来非常亲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负责编方志的同志曾跟我说，让我办个视频号，名字叫“读方志 看中国”。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很想试一把。

关于方言的搜集整理，是个系统工程，要有一定的时间、精力，更要具备历史、地理、自然、民风、民俗，甚至是音乐、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侯宝林的相声《戏曲与方言》。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其中的“学”多是会说地方方言。在文学写作中，很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使用方言，如莫言、贾平凹、刘震云等。大连女作家董晓葵和我认识快 20 年，记得她

2013 年就在供职的《海燕》杂志上开了专栏“大连方言”，每每读之都获益匪浅。了解一座城市、一个乡村，或许从地理、建筑、美食可以轻松进入，但如果去接触其方言，知道其方言的具体表述，那可就深入骨髓了。譬如，董晓葵在《海南丢子，此地巴子》一文中，就把大连方言中这两个带有重要人界分开的特征给讲得明明白白。所谓海南丢子，专指那些以齐鲁大地人群为主体的闯关东人群和他们的后裔。中国历史上的大移民层出不穷，或因为战争、灾荒，或因为国家战略需要，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每个人都有着撕心裂肺的记忆。刚看到海南丢子，我还以为是从海南省移民过来的，后来才知道大连隔海南面一百多公里就是烟台，大连人历史上就把海南边称作海南。海南搞清楚了，那么丢子呢？肯定是丢失的孩子，我还联想到弃子。在历史上，有许多弃子的故事。即使现代社会，也偶尔会看到有人将女婴或者生病的幼儿遗弃的事情发生。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电视连续剧《渴望》，女主人公刘慧芳的妹妹燕子在街上捡到弃婴小芳，被还是姑娘的姐姐刘慧芳收留，全剧就此展开了一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大连，甚至整个东三省，有着庞大的丢子人群，其中也包括来自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丢子，几乎占东北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大连人则把本地人称作“此地巴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坐地户”。在董晓葵看来，大连地区移民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在中国各地区之间是独具特色的。尽管故土难离，可移民也给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农业发展带来诸多好处，甚至改变人口、种族的现状。读董晓葵这篇文章，有三点给我带来启示或者思考：一是海南丢子和此地巴子在很长时间内是相对保持独立性的，如不愿意通婚，彼此的口音、饮食习惯很难统一，经过上百年才逐渐互相接受。二是在晚清时期，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为开发大连地区的海防建设，从山东、天津招来大批能工巧匠，使他们成为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这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带有选择性的，而且是素质较高的一次移民，对大连地区的人群总体素质提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是提到大连，很多人都会说大连足球牛叉，仿佛大连足球是另一个巴西桑巴足球。董晓葵分析说，这其中的道道来自两个原因：一是大连人接触足球早。1899 年，一群外国人坐大轮船来到大连，他们带来很多东西，其中就有“足球”。外国人喜欢在海滩踢足球，某一天他们来了兴趣邀请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一起踢。结果，一个叫小五子的“海南丢子”一脚把球踹到海里，远比老外 60 码大鞋底子踢得要远得多，这可把老外吓坏了。究其原因，“海南丢子”当初跨海北渡到大连，很多人是抱着枕木、舢板泅渡，想想看，一百多公里，不是人人都可以活下来的，生存下来的一定是身体最棒的。去年 11 月，在天津一个文学活动中，我见到素有“海碰子”之称的大连作家邓刚，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说得一口大连话，一本正经说如何到大海里捞海参。我问他七十几了，他说八十了。我说年轻时读您的小说《迷人的海》，那时您的照片老师了。他听着哈哈地笑，说现在不能嘚瑟了，不过他可以浪摆的是八十岁还开着车往全国各地跑，广东、四川、西藏等地他都去过。邓刚从小在山里长

大，离海边不远，我没问他的祖辈是不是“海南丢子”，瞅他那大块头、性格里的猛劲儿，应该八九不离十。

我这篇文章，原本想专门谈董晓葵笔下的大连方言，可一开头就思绪不断。我从她这本连语寻趣——《大连方言》里随便找几个方言，都可以写上一两千字。譬如“歹饭”。这个方言在大连具有普遍性，过去在湘西，甚至在北京也有人说过。与之相关的还有“歹酒”“歹菜”等等。北京人说话受满语、蒙语影响较大，有很多跟东北方言相似的地方。就说这“歹饭”，北京人热情好客，如果遇到饭点儿都要留客人吃饭，常爱说的一句话是——“别走，在家吃饭吧，好歹吃一口，不能饿着出门。”也有不用“歹”字表达的，如形容一个人饿极了，就说：“饿疯了，逮着什么吃什么。连死猫都吃。”除了吃饭，大连人还有许多方言，如强调对某一事物或人的爱憎，常爱用“血待人恨”“血不要脸”“血便宜”，而在北京则不用“血”，而用“忒”。大连方言也好，北京、上海方言也罢，大都有其土的特性。然而，在土的方言背后，也有许多方言颇为庄重、讲究。如你在西安旅游，向当地人打听到雁塔怎么走，西安人往往会说，“到前边右拐，端直走”。“端直走”，这三个字让人想到正步走。据说，这样的词在秦朝就出现了。那是当时的官话、普通话。同样，在大连，人们形容一个人社会交往能力强，有办法、有主张，便说那个人很有“章程”。

说起来大连人用大词官话，董晓葵在书中还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在她供职的《海燕》创刊 60 周年活动中，她无意间看到 1960 年第 1 期刊登的短篇小说《罗克逊先生输了》，作者的身份是造船厂工人。小说写一艘英国轮船在大连港触礁受损，傲慢的英国人罗克逊提出 20 天之内必须修好，我方考虑到船上装满海鲜，向罗克逊先生保证只要 8 天时间。在抢修期间，罗克逊经常上船冷嘲热讽、威胁恫吓，我方工人与他的对话句句大义凛然，没有一句方言俗语，外交辞令色彩很是强烈。这让董晓葵很是不解。后来，她在翻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报刊文学时，发现在很多乡土文学作品里，作家都大量使用地区方言，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同时也客观保护推广了方言。其实，以今天人们的眼光看，也不难理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写作为什么不使用方言，因为当时全国正在广泛地开展扫盲运动，推广普通话。

涉及方言的话题实在想说的太多。读董晓葵的《大连方言》，其意义不在于多了解几句大连方言的前世今生，而更多的在于思考：在诸多领域都在倡导创新创意的今天，我们有多少物种、非遗技艺、老乡村街巷正在大量消失。在消失的诸多物象里，有多少是自然的，有多少是人为的。我们不必抱着物象永恒的僵硬思想，可我们总希望那些老物件、老建筑能更多地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一段时间。方言也是如此。常有人到了大城市，害怕说方言，怕被别人看不起，我觉得大可不必。毛主席一辈子说湖南话，1949 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句庄严宣告，世界上有哪个人听不明白！诚然，在社会交往中，会说普通话，会说外语，也是现代社会之需要。如若还能加些方言，是不是更能体现我们的汉语魅力呢？

的生存瓶颈中解放出来。当人类掌握了“编码”与“解码”的冰冷逻辑，信息首次脱离了物理载体的肉身束缚。曾经，知识的传播速度等于马车的速度；如今，全球知识的同步只需毫秒。人类文明不再依赖少数口传心授的智者，而是将所有智慧的结晶化为云端共享的电流。一个非洲村落的孩子，只要能联网，就能看到麻省理工学院最前沿的公开课。科学消除了认知上的“地理隔离”，让文明的整体智慧呈指数级叠加，这种力量让人类集体智慧的“生长速度”远超任何一个生物学个体的寿命极限。这种温情，是“给文明以岁月”的雄心——它不负责擦干你当下的眼泪，但它负责为后世子孙锻造一副能够跨越星际、穿透时间、直面宇宙真相的铮铮骨骸。



2026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五 主编:赵命可
责编:秋川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 / 数字报 www.whysw.org

A06

文化藝術報

诗 歌 苑

一座矿山的回声

(外三首)

○ 李永刚

那年夏天,田里的麦子
已经回家了
麦茬还在回味着麦浪
我坐着东去的列车,咣当咣当
颠簸一路,22 岁的行李
停靠在一个叫韦庄的小站
把呼吸定型,青春压缩进一辆
苍老而卖力的客车上
比辗转还要辗转,下坡
顺着一条沟,驶进生活的纵深
那时,我不知道那条河叫县

西河

也不知道蔡家河叫蔡家河
当然也不知道新工地就叫新
工地

它们无一例外,后来成为我
人生的背景
最终,我知道
落脚的地方叫权家河矿
那晚,矿区的灯火照亮了梦想
矿车的声响撞击着夜的苍茫
自此,青春成为一枚钉子
钉进沾满煤渣的时光
从那时起,煤山就是人生的
靠山

煤的表情就是人生的表情
煤的心跳也成为我的心跳
煤的呼吸就是我的呼吸
脚下的路落满了煤尘
夜晚,每一粒星星
都好似睁着眼睛的煤炭
煤,已成为我的春风杨柳
秋霜冬雪,最终
成为我一生一世的火焰

想起煤,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于我和同龄的我们
1983 年,分明已是很久以前
仿佛,就是昨天
那年那月那一天
我的人生履历拥有了两个字
“煤炭”,它是我一生的标签
它给了我一种颜色
也给了我不曾熄灭的火焰
如今,一想起煤
如同农人想起庄稼
牧民牵挂草原

仔细端详一块煤

无论如何,肤浅的目光
是无法看透一块煤的深邃
我最先看到的是黑暗
渐渐地,我看到了一种
乌亮乌亮的闪光
无比内敛而又磊落飒爽的那种
黑色的光亮
看到了凝固的沉默
看到了血与压抑的哭泣
看到了黑色的怒吼
歇斯底里的大骂
然后,我看到了火焰在舞蹈
在歌唱,无比豪迈地
在跳动,在沸腾
在狂欢,在喘息
在熄灭,在沉寂

入井是这样的

穿好下井的工服
脖子上围好毛巾
再把脚埋进长筒胶靴
拿着长长的皮腰带
到充灯房领了矿灯,再领自

救器

把它们穿在腰带上,扣好腰带
这就下井去
这就开始和煤打交道日子
“咣当”“咣”——罐笼固定不变
而又异常熟悉的响声
是无法躲避的声音,耳熟能详
站在罐笼的那一刻,我会微

微闭上眼

感受短暂下沉的心理感觉
这是告别地面的感觉
这是忘却白天的感觉
到井下,便是用心和煤相处

的感觉

就是和石头不断凝望、对视
直至折服各种岩石的感觉
就是聆听顶板的水“嘀嗒嘀嗒”
不断叙说着远古的感觉
就是在一束束矿灯直射和晃

动中

让时光舞蹈的感觉
就是把人生交给黑色,让黑

色拥抱

让黑色包围,让黑色照亮的
感觉
就是把自己融入黑色的火焰

的感觉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科学：冰冷的温情（2）

○ 墨 耘

科学最动人的温情，藏在托举文明迭代、推动人类向上生长的磅礴力量里。熵增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数学家邓煜曾因相关领域突破获 2026 年菲尔兹奖）曾让浪漫主义者心碎——它无情地揭示：孤立系统内的无序度只会随时间增加或保持不变，永不自发减少。它宣告能量从集中走向分散，物质从有序滑向混沌，直至所有有效能量均匀消

散，宇宙最终走向死寂的“热寂”，这是时间单向流逝的物理根源。正是基于对“能量转化”的冰冷计算，人类才明白埋在地下的黑色岩石（煤炭）并非“脏石头”，而是亿万年前古生物储存的太阳能浓缩罐。科学教会我们如何把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蒸汽机），再转化为电能（发电机）。这直接引爆了工业革命，将人类从“依附于当年太阳光照（农业）”